

W.W.W.W.W

# 新闻研究资料

■ 白头记者话当年

夏衍

■ 我与《立报》（续）

萨空了

■ 一所并不理想的新闻学校

顾执中

■ 辛亥革命前大公报评论探究

何炳然

■ 延安《解放日报》大事记

王凤超 岳颂东

# 新闻研究资料

总二十六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  
《新闻研究资料》编辑部编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七月

责任编辑：阎焕芳

# 新闻研究资料

总二十六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

《新闻研究资料》编辑部编辑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景山学校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 8印张 180,000字

1984年7月第一版 1984年7月第一次印刷

统一书号：7190·021

定价：0.80元

# 目 录

## 回 忆 录

### 白头记者话当年

- 《建国日报》和《消息》半周刊 ..... 夏 衍 (1)
- 我与《立报》(续一) ..... 萨空了 (20)
- 一所并不理想的新闻学校 ..... 顾执中 (33)

### 关于《大公报》

- 辛亥革命前《大公报》的评论探究 ..... 何炳然 (51)
- 在《大公报》工作的十五年 ..... 王文彬 (81)
- 《大公报》和天津“左联” ..... 曹世瑛 (99)

## 专栏评介

### 街头巷尾觅心声

- 《羊城晚报》的“街谈巷议”评介 ..... 谢国明 (104)

### 关于《解放日报》

- 陈克寒同志谈延安《解放日报》 ..... 王 敬 (115)
- 延安《解放日报》大事记 ..... 王凤超 岳颂东 (125)

## 报坛杂忆

- 唐人轶闻轶事 ..... 刘时平 (176)
- 为一条标题辨正 ..... 黄立文 (181)

|                      |          |
|----------------------|----------|
| 代人写小说 .....          | 左笑鸿(183) |
| “西北经济考察团”所为何来? ..... | 袁义勤(185) |
| “绝命书”与“绝食” .....     | 牛青庵(188) |
| 花絮新闻三则 .....         | 张西洛(190) |

### 新闻学校·校刊

|                      |          |
|----------------------|----------|
| 华中新闻专科学校 .....       | 林 麟(192) |
| 三十年代一所民办的新闻学校 .....  | 阎少显(195) |
| 《辅仁通讯》的编辑和出版 .....   | 周 铭(198) |
| 以中间姿态出现的《大学新闻》 ..... | 童式一(204) |
| 我与《复旦新闻周报》 .....     | 杨 柱(216) |

### 报刊史料

|                       |                  |
|-----------------------|------------------|
| 《小孩月报》与中国近代启蒙教育 ..... | 费毓龄 陈祖思(218)     |
| 近代中国新闻事业史事编年(十八)      |                  |
| .....                 | 方汉奇 谷长岭 冯 迈(224) |

### 报刊之最

|                      |          |
|----------------------|----------|
| 最短命的报纸 .....         | (217)    |
| 内蒙古最早的小报——《婴报》 ..... | 席永杰(223) |

## · 回忆录 ·

# 白头记者话当年

## ——《建国日报》和《消息》半周刊

夏 衍

抗战胜利后不久，1945年9月初的一天凌晨，我在化龙桥《新华日报》看过了当天报纸大样，在编辑室的藤榻上休息了一刻，就下山坐公共汽车到赖家桥文工会驻地，去看鹿地亘夫妇。日本投降后，他们写信约我谈话已经不止一次了，主要要谈的是他们是否可以尽快回国，和“反战同盟”的那些盟员今后的工作问题。对他们两个，我劝他们“稍安毋躁”，还是等待美军占领下的日本局势明朗一点之后再说，“反战同盟”的问题，我认为他应该向郭老请示，事前不要轻率发表意见。鹿地和池田似乎都有一点神经质，一方面想急于回国，但同时谈话中可以听出也还有不少顾虑。和他们谈了大约一个半小时，就进城回到中一路坡下的“依庐”。那时正是毛主席和国民党进行“重庆谈判”时期，报社工作很忙，我已有十多天不曾回家了，可是到家不久，恩来同志就派人来通知，说有要事要我立即去曾家岩，我赶到五十号，恩来同志放下正在批阅的文件，对我说：“有一项紧急任务，中央决定要你立即回上海。”这对我说来，当然是一件非常高兴的事，我离开上海已经八年多，也很想去看看“光复”后的上海。恩来同志说：“国民党的中宣部下了一道命令，规定在北平、上海、武汉这些地方，

只有在抗战前或抗战中登记出版过的报纸，才准重新出版，国民党方面已经同意《新华日报》一家在南京或上海复刊，我们已派徐迈进到上海去进行筹备，但估计国民党还会设置障碍，所以想起了《救亡日报》，昨天我已和郭老谈定，由他通知潘公展，《救亡日报》是在抗战开始时就在上海登记出版的，按他们的规定，可以在上海复刊，所以决定你尽快去上海，会同徐迈进赶快复刊《救亡日报》。因为这是以郭沫若为社长的公开合法的报纸，又是四开一张，办起来比较容易。”当时“重庆谈判”正在进行，我方提的条件中，还有由刘长胜任上海市副市长这一条，所以我也觉得复刊的困难不大。恩来同志又说，上海这个地方很重要，一定要尽快建立我们的宣传阵地，我们会很快通知华中解放区和上海党组织，全力支持你们。当然，这张报纸，仍旧要以群众面目出现，即使谈判有进展，也还要注意“有理、有利、有节”这个方针。（最近出版的《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中，辑录了《尽快去上海等地办报》一文，这就是毛泽东、周恩来1945年9月14日给中央和华中解放区负责人的电报：“上海《新华日报》及南京、武汉、香港等地以群众面目出版的日报，必须尽速出版。根据国民党法令，可以先出版后登记。早出一天好一天，愈晚愈吃亏。”因此，那一天恩来同志要我赶快去上海复刊《救亡日报》，就是发出这一指示之前决定的。）我欣然接受了这一任务，只问：现在交通阻塞，坐船或长途车都会耽搁时间。恩来同志看出了我跃跃欲试的神情，笑着说，这些问题你可以不管，给你安排坐飞机去，只是你家里有什么问题要组织上帮你解决？我很快回答，没有问题，孩子大了（当时沈宁十四岁，沈旦华八岁），他们可以等《新华日报》复员时同走。恩来同志高兴地说：

好，那你赶快去作准备，接到通知随时就走，报馆的事，今晚就和梓年他们商量，你可以不去上班了。我说：“那不行，还有一些未了的事要交代，这几天还要去上班。”恩来同志点点头，说：“最好能在两三天内准备好。”

回到家里，把这件事告诉了妻子，她知道我可以先回上海也很高兴。说到准备，其实也很简单，除了把我1942年从香港回到桂林时在地摊上买的一套旧西装找出来洗烫一下之外，只打算带一只手提箱，里面装的是延安和重庆出版的几本小册子，和我在桂林、重庆写的几个剧本，——对了，还有半条“骆驼牌”香烟，那是赫尔利送给中共代表团的“礼物”。

当时我是《新华日报》的代总编辑，由于恩来同志说了报馆的事由他和梓年商定，所以谁来接替我的工作也没有过问，我只把要去上海的事告诉了王炳南、乔冠华、胡绳、熊复、陈家康，他们都对我的这个“好差使”表示羡慕，同时也告诉我上海这个地方情况复杂，要我特别小心。

我一直等着，可是，五天，一个礼拜，一直没有消息。我又去找了恩来同志，他似乎也有点生气了，他说申请信早已交出去了，一直没有答复，我今天晚上再向张文伯交涉，再不回答，我们就在谈判时提正式抗议。这一交涉果然发生了效果，两天之后的傍晚，恩来同志要我去曾家岩，把一张美军军用机的搭乘许可证交给了我，起飞的时间就在下一天上午8时。这时，恩来同志再一次向我交代了：报名可以改为《建国日报》，一定要争取公开合法，办报的宗旨依旧是团结、民主、进步，但重点要放在反对内战，争取民主这两个问题上。他把到上海后联系的地点和口号告诉了我，然后说：你是“老上海”，但离开久了，凡事要听取和尊重“二刘一张”（刘晓、刘长胜、张



执一)的意见。我已经给上海发了电报,你这次去是单枪匹马,但张登(沙文汉)、梅雨(梅益)都会帮助你的,还有先到了上海的徐迈进。但要注意,你和徐工作上要合作,但两份报的性质一定要分开,《新华日报》是党报,《救亡日报》是民办报,千万不要混为一谈。天快黑了,我打算在五十七号吃晚饭,多听听恩来同志的指示,同时也想和冠华,龚澎、家康等人讲几句告别的话,但恩来同志不同意,他说,明天恰好是旧历中秋,你得回去和太太、儿女吃顿团圆饭再走。

9月20日一早,《新华日报》派了一位同志(很遗憾,连这位总务处的同志的名字都记不起了)用一辆吉普车送我到了飞机场。这是一架双引擎螺旋桨军用机,除了美军的机上人员之外,这架可以乘四、五十个人的飞机上只有十来个国民党的公务人员,看样子,没有一个高级官员,我一个人也不认识。飞机准8时起飞,这架飞机大概是运货用的,没有座位,大家席地而坐。有雾,下面连嘉陵江也看不到,我就靠着机壁睡着了。11点钟到了武汉,停机加油的时候我没有下机,美军的机组人员也在机舱里铺了一块地毯,象吃野餐似的在吃中饭,我啃着一块硬面包,一个细心的美军还送了我一瓶可口可乐。一小时后继续起飞,这时才看到了沿江一带被炸了的房屋,和池塘一般大的弹坑。下午5时左右到南京,机场还没有被炸,但除了少数穿黑制服的旧警察之外,全是缴了械的日本兵,9月的南京天气还很热,他们光着膀子,飞机着陆的时候,还乖乖地推舷梯,给美军驾驶员提箱子,再没有“皇军”那种威势了。我下机后跟着那些国民党的公务人员走出机场,门口停着一辆涂了防空色的大卡车,大家一起上了车,一直开到市内的一个美军机关门口,什么手续也没有,那些国民党人大部分是

有人在那里迎候的，只有我一个人提着箱子下车。我想找个旅馆过夜，可是跑了好几家都是客满。时间还早，我就到路旁一家相当高级的理发店去剃头，可是一进门就使我吓了一跳，几个理发员一起站起身，非常恭敬地说：“请坐，请坐。”原来他们看见我手提箱上有一张上飞机时美军服务员给我贴上的到南京的标签，所以他们就认出了我是“重庆来的人”了。他们非常客气，而且还讲了“好容易盼到你们回来了”之类的套话。接着，还有一位穿白衣的女服务员端了一张矮凳坐在旁边，给我修指甲（这是我平生第一次遇到的事）。理完了发，要付钱的时候，又发生了没有想到的问题。我身边只有“老法币”，而当时南京使用的还是“伪币”，国民党也还没有规定“法币”和“伪币”之间的比值。我拿一张五块的法币，理发员愣住了，跑去和店主商量，店主也似乎没有办法，走过来恭恭敬敬地说：“您先生在内地辛苦了，这，我没法找，不用付了。”这种好意当然是不能接受的，我只能说，我刚下飞机，只有“法币”，你随便给我换散了吧，反正我要有零花钱。推让了好一阵，他才把五块钱收下，等了好一会，才找还了我一大把伪钞。我数也不数地塞进衣袋，然后在他们“恭送”中出门。

沿着闹市找旅社，事有凑巧，当我走进中央大饭店的时候，迎面碰上了卜少夫。卜是反共专家，在重庆办一份叫《新闻天地》的杂志，但三十年代初他在中华艺大读过书，所以见了我还叫我“老师”。这一下我觉得有办法了，我说，刚下飞机，找不到旅馆，你给我想想办法。他说现在复员的人太多，找房间不容易，然后很慷慨地说：“如不嫌弃，就在我房间里挤一下吧。”原来他月初就到了南京，租了一间双人房，还空着一个床位。于是我就实行“国共合作”，在他房间里睡了

一夜。

第二天一早，我就坐三轮车赶到火车站，不明市价，抓了一把伪币给他，可能是给多了一些，这位三轮车夫十分巴结，给我叫来了“红帽子”（从前火车站上搬行李的工人都戴红帽子），给我提行李，还特别关照，“这位先生是重庆来的。”到售票处，已经挤满了人，这位“红帽子”对我作了个眼色，要我跟他走，就顺利地通过检票处，一直送我上了头等车，我正要付钱，他就给我找来了车上的服务员，并代我说：“这位先生是重庆飞来的，你给车上补票吧。”我掏出伪币来，“红帽子”却笑着说：“先生，给我一张老法币吧。”我满足了他。我不知道到上海要多少钱，就把伪币全拿出来放在桌上说了一句“到上海北站”，指着伪币让他取，他数了一下，说还不够，于是我又只能拿出五块老法币，他高兴地给我补了票，还给我沏了一杯上好的龙井。这种做法，现在看来，也许可以看成是一种特殊优待或特权，也可以说是不正之风吧，可是在那个时候，千千万万受尽了敌伪压榨的人，对从大后方来的人表示一点好意，给一点方便，也未尝不可以说是沦陷区人民的一点爱国的心意吧。

火车开得很慢，到上海已经下午两点多了。我到爱文义路至德里我岳父家里住下，第二天一早就到指定的地点去接关系，地点好像在愚园路，我已经记不起了。奇怪的是不待我说约定的口号，开门接我的竟是我的老熟人沈德均，二十年代末我就在蔡叔厚家里认识了她，她的爱人江闻道也是我的朋友。我交了介绍信，她说，这儿是联络站，介绍信立刻可以转去，但是老刘（刘长胜）这几天不在上海，你休息几天再说吧。我告诉了她组织上交给我的任务很急，“报纸早出一天好一天”，所以

把我的住址和电话号码告诉了她，希望能尽快见到梅益或者徐迈进。

当天晚上就接到了梅益的电话，约我第二天上午到朱葆三路二十五号二楼十一号见面。

朱葆三路二十五号是一幢中等水平的办公楼，我上二楼就看见一块“新华日报筹备处”的招牌，推门进去，徐迈进和梅益已在等我。他们租了两大间办公室，很宽大，够得上二十来个人办公，但是只有一个书架、两张写字台和几把椅子，所以显得空空荡荡。坐下来我讲了一些前天在南京的“中秋奇遇”之后，梅益就说，他们已经接到恩来同志的电报，要他们全力帮助我早日出报，所以问我哪些事要他们帮忙，如要不要租办公楼，要几个记者、编辑等等。我想了一下，说：办一张四开小报，你们已经租了这两大间房子，只要给我一张写字台，在这里挤一挤就可以了。但是，恩来同志再三叮嘱，一方面要我和迈进通力合作，但《救亡日报》仍旧要保持民间报纸的特点，不要和党报合在一起，所以还得帮我租一间小小的编辑室，最好在离此不远的地方，便于联系，至于记者和编辑，我看只要介绍一位能跑能写的记者，和一个传递信件和管杂务的工友就够了。反正这张报有一个靠当地文化界支持的传统，所以只要老梅开一张可以给我们义务撰稿的人的名单就可以了。我在重庆就知道姜椿芳他们办了一个时代出版社和一张《时代日报》，所以我说，必要的话，我可以找老姜那里的人帮忙。他们都同意了我的意见，决定租编辑室和找记者、工役的事由梅益负责，迈进则帮助我代管一下总务工作。最后我说，这张报不管办得怎样，无论如何要尽快出版，所以一切准备工作都要在一星期内办妥。

我利用这一星期的时间，拜访了留在孤岛奋斗的先辈、旧友（郑振铎、夏丏尊、傅彬然……和梅益开给我的名单上的知名人士马叙伦、周建人、许广平、周予同），转达了郭沫若社长对他们的问候，和希望他们对即将出版的《建国日报》的支持。这之间特别要提到的是当我去访问卧病中的夏丏尊先生的时候，他表示开明书店愿意出版我在大后方写的那几个剧本。这件事对我个人说来，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因为1946年我去新加坡和香港之后，我在上海的家用，就靠这儿本书的版税。其次是我去拜访了李健吾先生，我和他素不相识，但在孤岛时期，他自告奋勇地当了我在上海的著作权益代理人，上海进步剧团演了我的剧作，他就代我收上演税，把它送给我的妻子。他是一个十分仗义的人，我向他道谢，他还说事情办得不够周到及时。也是在他家里，我认识了顾仲彝和苦干剧社的几位演员。我认识钱钟书先生和他的夫人杨绛，也是健吾给我介绍的。

《救亡日报》复刊的事进行得顺利，梅益帮我在泗泾路美生印刷厂楼上找了一间厢房作为“编辑部”，并介绍顾家熙同志作为报社唯一的记者。一切筹备就绪之后，我就根据国民党中宣部发表过的凡抗战前或抗战中出版发行过的报刊可以先复刊后登记的规定，给国民党市党部发出了一封《救亡日报》改名《建国日报》，申请登记的公函，这张小报就在1945年10月10日正式复刊了。

《建国日报》除报名外，依旧用了原来的报头，即：“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主办，社长郭沫若，总编辑夏衍”。在第一版上，我写了一篇《复刊词》，开头就说：

民国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二日，敌侵松沪，我军奉命撤守，在那

个最黯淡的日子，本报发表了社长郭沫若先生悲壮的社论：“我们失掉的只是奴隶的锁铐”，忍泪暂时和上海的读者告别。……但是八年以来，我们永远没有忘记告别词中的一句充满自信的预言：“上海克复之日，就是本报再和读者相见之时”。现在，抗战胜利，淞沪重光，我们就间关万里，回到上海，再把这张小小的日刊贡献给阔别八年的读者。说“我们失掉的只有奴隶的锁铐”，在当时，我们的确是除了奴隶的锁铐之外，再没有可以失掉的东西了。这锁铐在我们民族身上已经戴了近一个世纪，使我们中华民族一直停留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状态。日本军阀想要灭亡中国，征服世界，在“八一三”那个时候，他们以为这是个戴了锁铐的东亚病夫，是决不会成为他们征服世界这雄图的障碍的，可是，出于日本军阀的意料之外，中国人民终于不顾一切地站起来了。日本军阀希望我们不抵抗，我们抵抗了；希望我们不团结，我们团结了；希望我们不进步，我们进步了。从一年打到八年，从上海打到桂筑边境，不屈服，不沮丧，以血肉之躯来抵抗飞机大炮，用无比的坚韧来度过了长期的苦难，这是二十世纪的一个奇迹，这是中国人民有史以来最大的试炼，而现在，戴在我们民族身上近一百年的锁铐终于打碎了。在抗战中，作为新闻记者，我们以文章报国之心，我们呼吁团结，呼吁进步，呼吁全国人民一心一德，把抗战进行到底，而今，抗战胜利，建国开基，我们必将以更大的努力，号召全国同胞在和平、民主、统一的大旗之下，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抗战八年，民亦劳止，为了中国的民主团结，为了世界和平，我们必须迎头赶上。致力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复刊之始，感慨万端，《建国日报》是人民的报纸，我们必当永久地以人民的意志为意志，以人民的立场为立场，这一小小的刊物，能否对国家、民族的前途有所贡献，还是期待于广大读者的支持与指示。

一张四开报纸的版面，是很难安排的。我们仍旧辟了一版

名叫《春风》的副刊，创刊号上我也写了一篇题为《杂谈副刊》的发刊词。此时，考虑到沦陷了八年的上海人民不太了解所谓“大后方”的真实情况，而国民党的党报又不断地制造谣言，美化他们的“领袖”和吹嘘那批常败将军的“战果”，我们也就针锋相对地用“记者”署名，每天发一篇四、五百字的“乱离人语”，来揭露大后方的各种奇闻怪事。

10月12日，恰好有一位外国的进步记者飞往重庆，我就把10份《建国日报》托他带给了龚澎。

报纸虽小，五脏六腑俱全，所以一出版，就颇受上海市民的欢迎。记得出到第五、六期，就销到五、六千份，这在报贩完全在国民党控制之下的上海，总算是不容易了。还有一件事，我们捅了一下当时以太上皇自居的美军的马蜂窝，这就是从中央社发的二十几个字的短消息中，我们了解到美军打死了三轮车夫臧大咬子的消息，我们唯一的外勤记者顾家熙根据线索，访问了死者的家属，写了一篇专访，并鼓励他们提出抗议，在舆论界引起了不大不小的抗议美军“残杀臧大咬子”的风波，使国民党当局十分被动。由于这张小报“敢讲话”，所以我写的一则只有五十来个字的补白：“（一）上海人最怕两种人，一种是从天上飞下来的，一种是地下钻出来的。（二）要在上海找房子，必须要两种条子，一种是金条，另一种是封条。”我把这五十来个字画了一个小花边，本来是一种讲怪话出口气的意思，可是想不到这两句话很快就传开了，外埠还有几家进步报纸转载，我也觉得很高兴。

但是好景不长，这张报出了12天，到10月22日，国民党市党部就下令查封。我立即赶到市党部去抗议，一个姓陈的党棍，可能是陈训念，我记不清楚了，大摇大摆地接见了，凶狠

狠地说：“这份报纸没有登记。”我拿出重庆报上登过的国民党中宣部的规定，“凡在抗战前或抗战中出版过的报刊可先出版后登记”给他看，并说：“我们在10月7日就用挂号信向你处登记。”他居然脸也不红，说了一句：“禁止发行，这是政府的命令。”背转身就走。我说：“政府违法，我要抗议！”他躲得快，装做没有听见。

12天，这大概可以说是最短命的报纸了。我分别向恩来同志和郭老作了报告，希望就此事向国民党提出抗议。当然，我也知道，这种抗议是不会得到结果的。因为，《建国日报》复刊那一天——10月10日，国共两党在重庆签订了“双十协定”，但是与此同时，蒋介石又在美国的帮助之下，积极进行全面内战的准备。所以，10月25日我和刘长胜、梅益等商谈《建国日报》被封的善后问题时，我们考虑的已经不是争取《建国日报》复刊，而是防止国民党对“新华日报筹备处”进行迫害和袭击的问题了。也就是这一天，我接到了王若飞托人带来的一封信，内容是说，他和董老看到了《建国日报》的创刊号，非常高兴，并说董老和郭老看了我写的那篇“复刊词”，都认为写得很好，措辞也很得体，一方面对我们“孤军作战”表示赞许，同时也讲到尽管缔结了“双十协定”，但东北、华北乃至华中，形势继续恶化，要我们保持警惕。

《建国日报》出了12天，有人说我“唱独脚戏”，也有人说所有文章都是我一个人写的，是“单口相声”，而事实并非如此。社论、副刊上的文章，及“乱离人语”，的确是我写的，但当时还没有公开出面的恽逸群同志也写过几篇文章，而“本报专访”，如关于“臧大咬子事件”的报道，和许多本埠新闻，则都是顾家熙写的。



《建国日报》被封，《新华日报》不能复刊，偌大的上海和华东一带，没有一个我们的宣传阵地，南方局9月14日电报中提到的范长江、钱俊瑞、阿英又没有能赶到上海，我们该怎么办？当时上海只有一份马叙伦主编，实际工作由唐弢、柯灵在办的《周报》，郑振铎、许广平都在这刊物上写文章。我拜访马老的时候，他也要我写稿。但国民党的《中央日报》等许多日报都在上海复刊了，在“孤岛”上待久了的人又或多或少地对那位“六十衰翁”还有一点幻想，不在大报上打开缺口是不行的。我对梅益建议并立刻得到上海党组织的同意，我们也可以运用全国人民希望和平、民主的愿望，和国民党当时还不敢公开打内战和反苏反共这一点，团结一批爱国的、热爱和平、反对内战的上层知名人士和学者，请他们以个人名义写文章，通过各种渠道打进《申报》《时事新报》乃至《中央日报》里去，逐步地形成一种“反内战”、“要民主”的舆论。我们分头走访了马叙伦、郑振铎、许广平、宦乡、周予同、傅雷、李健吾……请他们撰写有关当前时局的专论，然后通过马骥良（唐纳）、柯灵等的关系，把这些文章在国民党办的和民办的大报上发表。由于当时正处在一个“谈谈打打”或“明谈暗打”的特定时期，美国也还口口声声以“和事佬”自居，所以我们组织的那些主张和平建国的知名人士的文章，连《中央日报》也登了不止一篇。自己没有宣传阵地，而以组织文化学术界知名人士撰写反对内战、要求和平建设的文章，在上海各大报上以“专论”或“本报特稿”的方式陆续发表，造成一种颇有声势的舆论，我们这种作法曾受到过王若飞同志转来的南方局的表扬。据我回忆，直到1946年初，由于抗战末期进入东北的苏军拆卸和运走了日伪所属的所有工厂设备和机器，国民党在全国